

论王禹偁的论体文

陈为兵

(贵州财经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 作为北宋初期重要的作家, 王禹偁的论体文题材广泛, 内容丰富。史论主要是就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阐发自己的看法, 政论主要就政治问题发表见解。不管史论还是政论, 驳论是其主要特点。

关键词: 王禹偁; 政论; 史论; 驳论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115(2014)06-0041-03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4.06.010

The Research on Wang Yucheng's Lun

CHEN Wei-bi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writer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Addition to the wide range of topics on the body of the text, Wang Yucheng's Lun is rich in content, and the body of the text are widely ranged. Shilun expounds his views on the historical figures and historical events, Zhenglun expresses views on major political issues. Whether or History of Political, Bolun is the main features.

Key Words: WANG Yu-cheng; Zhenglun; Shilun; Bolun

王禹偁是北宋初期重要的作家, 是“连接唐之李杜韩白与宋之欧苏的关键人物, 也是形成宋代诗文特色主流之先河”^[1]。其一生创作丰富, 其作品主要收在《小畜集》和《小畜外集》中。

关于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它的定义以及写作注意的文体阐释得已经相当清楚: “论也者, 弥纶群言, 而研精一理者也。…原夫论之为体, 所以辨正然否。…其义贵圆通, 辞忌枝碎, 必使心与理合, 弥缝莫见其隙; 辞共心密, 敌人不知所乘: 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 贵能破理。斤利者, 越理而横断; 辞辨者, 反义而取通; 览文虽巧, 而检迹知妄”^[2,p327-328]。大意是: 论是一种综合概括各种观点、集中阐述某一个道理的文章体; 它论的作用是把道理的是非曲直讲清楚, 重在全面通畅, 言辞切忌支离破碎; 思想和说理一定要统一, 不能留下任何漏洞; 论辩要严密, 不给对方可乘之机; 分析问题要遵循逻辑, 否则只靠在文字上投机取巧, 那么即使勉强把道理说通也难免不会不被人发现破绽。

关于论体文的分类, 吴讷曰: “梁昭明《文选》所载,

论有二体: 一曰史论, 乃史臣于传末作论议以断其人之善恶, 若司马迁之论项籍、商鞅是也; 二曰论, 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 或评经史之言, 正其讹谬, 如贾生之论秦过、江统之论徙戎、柳子厚之论守道、守官是也。唐宋取士, 用以出题, 然求其辞精义粹、卓然名世者, 亦惟韩、欧为然”^[3,p1623]。徐师曾又将论分为八品: “一曰理论, 二曰政论, 三曰经论, 四曰史论, 五曰文论, 六曰讽论, 七曰寓言, 八曰设论。其题或曰某论, 或曰论某, 则各随作者命之, 无异义也”^[3,p2102]。

王禹偁的论体文题材广泛, 内容丰富, 作品主要是史论和政论。史论主要是就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阐发自己的看法, 如《霍光论》《霍王元轨论》《李君羡传论》《郑善果非正人论》《杨震论》和《省试三杰佐汉孰优论》; 政论主要就政治问题发表见解, 如《用刑论》《既往不咎论》《朋党论》《先君后臣论》和《省试四科取士何先论》。不管史论还是政论, 驳论是王禹偁论体文的主要特点, 就是先提出一个观点, 然后再予以反驳, 最后再阐明自己的主张。

基金项目: 贵州财经大学人才引进项目

收稿日期: 2014-04-29

作者简介: 陈为兵 (1974-), 男, 山东日照人,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古典文献。

一、史论

王禹偁对历史人物持有三种态度：一是批评，二是惋惜，三是褒扬。但不管什么态度，以史为鉴、借历史人物说事或者表达自己的主张及看法是王禹偁史论的基本内容和目的。

在史论里，王禹偁对一些历史人物进行了批评，从中总结出能够给后人以警戒意义的道理。在论证的时候有驳有立、驳立结合，一般情况是先摆出别人的观点、树立个靶子，然后再通过论证推翻这个观点，从而达到批评的目的。如《霍光论》^[4,p207]，开头先摆出“光之族也，光已死，罪在妻子，不在于光”的错误观点，然后从霍光自身和吴起、邴吉等人的角度进行批驳，批评霍光在妻子“显骄纵，欲贵其女而鸩许后”的情况下，不能“明大义灭亲之道、收显下狱，免冠请罪，因上印绶、还政事”，依然“眷恋私恩，犹豫不决，奏免太医以藏大逆”，因此才有灭族之祸，“光自族其家，非显禹之罪也”。又如，《郑善果非正人论》先提出“史臣谓郑善果幼事贤母，长为正人”的错误观点，接着通过郑善果的言行来进行批驳，批评郑善果一不能事母如孟轲、二不能“见危致命、奋不顾身、光肯构之孝心、励尽忠之臣节、扬没后之誉、立当世之功”，如此怎么可能“幼事贤母，长为正人”^[4,p212]呢？告诫后人如果为正人就必须“临难无苟免、危邦不入”，否则则会“辜负邦家、污辱祖考”。

除了批评外，王禹偁在史论里还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褒扬的同时表达了惋惜之情。如《霍王元轨传论》赞美唐高宗的儿子—霍王元轨具有“贤能”“武艺”“孝”“礼”“智”“仁”“义”“善任使”“识廉隅”的诸多优秀品质，认为霍王元轨在唐高宗诸子中在为人行事方面“称首”，“向使登元良之位、守宗庙之器，则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未足多也，惜哉！”可谓仕途失意、空负满腹才华，可见王禹偁在赞美霍王时透露着惋惜和遗憾之情。

但褒贬人物并不是史论的主要目的，王禹偁的主要目的是从这些历史人物身上挖掘可供当世借鉴的意义。如《霍光论》，作者从霍光身上总结出两点教训：一是做人臣者不能据贪天之功为己有而不割爱让德；二是不能正其心则不能修其身，不能修其身则不能齐其家，不能齐其家有怎能治其国？又如，《郑善果非正人论》告诫后人如果为正人就必须“临难无苟免、危邦不入”，否则则会“辜负邦家、污辱祖考”。

不仅被批评的历史人物有可兹借鉴的东西，就是连被王禹偁褒扬的人物身上也有发人深省的意义。如《霍王元轨传论》就有“王罹窜黜，卒以令终，天之善福，讵无验乎”之叹，后文又说元嘉狂悖起兵终“貽污宫之活、取笑后代”，来告诫后人只要平时德行兼修其后自会有福。再如，《杨震论》中杨震为官行事无愧于比干，但其后代杨彪、

杨修之辈不是于乱世中全身远害就是投身乱臣、坐法伏诛，与祖宗之风相去甚远，作者由此感叹：“呜呼！震杀身奉国，以训子孙，子孙犹不能及，况悠悠世人哉？而又混三仁之名迹、开去就之蹊径，欲望教人行劝，其可得乎！吾故曰：褒干显震而起教劝人，不其然欤？”结合前面所云“夫人莫不乐生恶死，非笃于名教者不能杀人以成仁。是以趋生易、即死之难不待诱而然也。立言垂教者当劝其所难、沮其所易”^[4,p213]。可以王禹偁借杨震之事来告诫后人要注重名节，必要时可以杀身成仁。

又如《李君羡传论》，作者在文中明确指出本篇史论的借鉴意义：“叹君羡之罹罪无状而见诛，惜文皇之用刑有时而不中，因论以志之，亦以为君臣之失矣”^[4,p212]。唐太宗因为听信“女王昌、当有女主武王者”而忌讳李君羡“封邑皆有武字、又名合女主之谶”从而诛杀之，造成了一大冤案，作者认为其中的教训可供后之君臣引以为戒：“天文变于上，人谣腾于下，虽圣人不能不疑惧矣。惧而修德，可也；疑而行诛，则有陷于非罪者也。然君羡，匹夫之命，不足道也。洎武氏出，则太宗之德得无累乎？故书曰‘疑谋勿成者’为是也。”可见文章并不是仅仅叹息李君羡无辜丧命，而是告诫后之君主疑谋勿成以免错杀大臣。

再明智的君主也可能会因为猜忌而诛杀大臣，那么作为臣子的也应该懂得把握形势、趋利避害，《省试三杰佐汉孰优论》^[4,p258]就是表达这种思想。文中指出张良、萧何、韩信都对汉朝立下过汗马功劳，但“辅弼则同，优劣斯异”，“萧张，人之功也；韩信，犬之劳也”，并认为张良“得名遂之道”，而“萧公受系，韩信受戮，虽功成于前，终貽戚于后，未若定储君之计、从赤松而游，远害全身，垂名于万世，不为优哉！”可见功臣不能居功不去，这与《霍光传论》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

二、政论

和史论一样，王禹偁的政论也是以驳论为主，有感而发，而且行文的目的也重在以古鉴今；相比史论而言，王禹偁的政论文更有现实针对性。

如《用刑论》就涉及到了如何使用刑罚的问题。文中通过对今之法和古之法对“出入人罪”界定标准的对比，认为今之法制过于严苛，若想实现“刑措”的目的就必须施行孔子时代的法律，要宽严相济、恩威并施，不能少恩深刻、滥施刑罚，否则恰得其反，其中孔子所说的“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再如《朋党论》就对朋党这一关乎唐宋命运的大问题有了深刻的见解。针对唐文宗“破河北贼易，破此朋党甚难”的错误论调，王禹偁认为朋党问题从尧舜时代就有了，不足为奇，关键的问题在于“君子直，小人谀。谀则顺旨，直则逆耳。人君恶逆而好顺，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如果君天下者诚能践行“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

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的古训，像尧舜那样“以德充化臻”“彰善明恶”，那么朋党问题就不难处理了。文末作者针对“奇章全德而不免窜逐，赞皇忌刻、逢吉倾巧而至大位”的局面直斥唐文宗“谁咎哉！又谁咎哉！”，反复责问，语气强烈，可见作者对帝王造成朋党之难的不满，认为帝王难辞其咎，这无疑是一种警告。

帝王如此，做臣子的又当如何？王禹偁认为做臣子就必须首先明确君臣之分，不能首鼠两端、摇摆不定。《先君后臣论》对春秋时期卫国大夫公叔痤对卫鞅（后来的商鞅）“始请用、中请杀、终使逃”的做法进行了批判，认为其“先君后臣”的说法是非常滑稽可笑的。王禹偁认为“为社稷之臣计安危之事者，在任贤去不肖而已”，除此之外不能再有别的什么不端想法，“予恐后之为人臣计国事者复履其迹，因论以明之”。

关于君臣职分，王禹偁还认为无论君主还是臣子都应该有所担当，如果“睹国家昏乱、政教缺失不能救者，率曰：事已成矣，吾不说矣；事已遂矣，吾不谏矣，且既往不咎，圣人之旨也”，那么就会“上安其危，下稔其祸，事卒不言，言卒不听，覆亡而已”（《既往不咎论》）^[4,p208]。另外，王禹偁还提到了科举取士的问题，认为取士当以德为先，这在他的《省试四科取士何先论》^[4,p459-460]中有系统的阐述。王禹偁认为“古者立乡里之选、采廉让之名登于三庭、贡之天府”就是坚持以德取士的体现，如果只以言语取士，“则不过善应对、专议论，及其失也，则捷给、

纵横、辩说之流”；如果以政事取士，“则不过守循良、明法度，及其失也，则苛刻、聚敛、刀笔之徒”；如果只以文学取士，“则不过通古今、明记叙，及其失也，则浮华、巧艳、谄谀之辞”，因此“修其德、立其行，则言语、政事、文学可以兼而有也”。

王禹偁还打了比方，认为“德行之于人，犹车之有轮、舟之有楫不可斯须而离也”，所以“善取士者，必能使师表一人、富寿百姓”。如此，“其为言也，垂于后；其为政也，利于时；其为文也，归于理。不离坚合异以侈其言，不乱常变古以施其政，不寻章摘句以骋其文，赫乎功名，与天地共尽，则德行之效，不亦章乎！”据此，王禹偁认为当今帝王如果“酌古典、行帝道”就应该“执取士之柄，致得人之昌，文物声明，与古争轡，在乎厚德行而薄言语、卑政事而贱文辞”“四科之名归乎德，使天下三尺童子知吾君好德之心，则取士之道其在兹乎！”整篇文章分条析理、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从容不迫、说理透彻，不愧为太平兴国八年（983）省试第一文。

[参考文献]

- [1] 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68.
- [2] 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 [3] 王水照.历代文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4] 王禹偁.小畜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责任编辑、校对：王文才）